

陌生的名人

——阿兰·罗伯-格里耶访谈录

[法国]伊莱娜·弗兰整理

单燕译

阿兰·罗伯-格里耶,1922年生于布雷斯特,就学于巴黎,于国立农艺学校获得农艺工程师证书,长期在国外工作。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53年,成名作《橡皮》。从此,他共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制作了七部电影,并在美国讲学,被认为是“新小说派”的代表。法国《读书》杂志第二百八十七期刊登了伊莱娜·弗兰整理的阿兰·罗伯-格里耶访谈录。

问: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外国,只要提到您的名字,人们就会点头称道。但您已有很久没出新书了。您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答:我用安迪·瓦罗尔的一句话来回答您:“我尤其因我的名声而闻名。”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有时人们与我攀谈,得知我的名字以后总是很震惊:“您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我回答“是”,又问:“您看过我的书吗?”回答是“没有”,依然震惊的口吻:“能够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人们总是这样。

问:您认为这种态度源于什么?

答:我想是由于我的名字:这是个精彩的名字。克洛德·西蒙、阿尔贝尔·加缪,这些名字都不太有特色。

问:这是个笔名吗?

答:不是,这正是我自己的名字。我本来可以重新取一个名字,正如那些日本作家每人都有笔名,而人们总有一个战时名字一样。

我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它有点喜剧味儿,有点复杂,因此是个严肃的名字。

问:您是怎么成名的?

答:几乎是一夕成名。《橡皮》之后,《窥视者》给我带来了名声,这个成功不甚光彩。在这之前,整个批评界对《橡皮》一书完全保持沉默。而当《窥视者》出现时,他们已经疲于一直谈论萨特和加缪。于是他们转向我,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说明我是不可能被读懂的。这些翻云覆雨的人就是罗贝尔·坎特,罗贝尔·肯普夫,亨利·克鲁阿尔。对他们来说,文学止于巴尔扎克;他们惊人地无知,尤其对于外国文学,他们甚至从未读过卡夫卡和福克纳。除了莫里亚克、莫洛亚和蒙泰朗,什么都不存在。

问:提及他们似乎让您很开心?

答:太开心了!我的确够开心的了。他们有时候会很夸张:埃米尔·昂里奥曾有一次

在《世界报》上登了篇文章,说我是个疯子,甚至很可能是个杀人犯。

问:您的外表对您的成名曾有所帮助吗?

答:我长得并不恐怖。当时,我留着一绺滑稽的小胡子;而当拍电视的人来的时候,我的太太卡特琳娜提醒我,说我在屏幕上的形象很过不去。她觉得我是个好丈夫,而不是个“帅哥”——我的面部线条太软;我太懒,因此决定留胡子。她觉得这样好多了;而她是正确的。多年以后,推荐我进入纽约大学法语系的该校校长汤姆·毕肖普给我看他的照片集:他和戴高乐、福克纳、贝克特等人在一起的照片。他指着一张我不留胡子时的照片,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如果你还是这副样子,我怎么也不会推荐你的。”

问:五十年代的批评家们把您当作丑角来介绍,有没有使您成为一个畅销书作者?

答:恰恰相反——我非常出名但卖不出一本书。人们到处随便引用我的文章。我记得那时,为了了解别人对我的评价,我订阅了《新闻观察》。每天早上,我都收到一沓沓的文章;因为我为每则比较重要的引文付一法郎,我付出了大大超出我的版税的数额,最终不得不取消订阅……十多年间,我一直是个名声在外却完全不被了解的作家。人们不停地传播一些关于我的荒谬言论,说我要做一个“客观的小说家”,要以物取代文学中的人……事实上,我们不会因为理性的东西而出名——只要看看萨特的成名历程就知道了。而我呢,人们总是把非理性的东西无偿地归于我……

问:您是什么时候真正被阅读的?

答:可能是从我被列入“新小说”作家行列开始,这是一些很早就出版作品但一直被忽视的作家,如娜塔丽·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等。那时,罗兰·巴特,莫里斯·布朗肖,乔治·巴塔耶在媒体中没有任何分量。

问:您就成为一种时髦的现象啦?

答:是的,但随着这种现象的逐渐消逝,

我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科克托说:“重要的,在于超越时尚。”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因为看到大量的关于我的文章,好奇的人们开始读我的书。另外,我现在有一个相当年轻的读者群。这也是我把自己的作品中最不畅销的书以袖珍书的形式出版的原因,这与出版业的惯例恰恰相反。这些书也是我最喜欢的,如《金三角的回忆》。看来,现在的年轻人读我的书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可以靠我的版税生活。远非富足,但刚好够用。

问:您最畅销的书是哪些?

答:“畅销书”这个词太大了。《约会的房子》最初的法语版本应该达到了三万至四万册。而我的电影,两个月间在巴黎的观众人次达到十万至十五万。

问:您对此如何解释?

答:在我的电影里,人们捕捉到了性与幽默,然而在我的小说中,他们感觉不到。例如,《嫉妒》在我看来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恐怕我是惟一个觉得它有趣的……但卡夫卡认为《审判》也很有趣。

问:可能就是由于名声在外的复杂与严肃让您的作品不是那么普及,是吗?

答:是的,但这对我的形象有好处。雷蒙·格诺与我正相反,他由于作品让读者笑得太多而名声受损。至于我,人们总是说:“要让人厌烦,再没有谁能胜过罗伯-格里耶了。”

问:在拥有您自己的读者群之前,您靠什么生活?

答:我持有农业工程师的文凭:在那个没有失业的年代,只要到农艺学校校友办公室报到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在五十年代,我们还没有把文学当作职业,更不要说把它当作生活来源了;我们不排除贫穷。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住在朋友借的房子里,穿他们不要的衣服。我们不去餐馆也能够很容易地活下来。但这种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一

个年轻的作家必须拥有一套房子,一条狗,一个女人,一辆汽车,以及一条金鱼。他希望自己的作品畅销,并通过其作品生活得很好。而他的文学越不妨碍什么,他将越能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

问:这是批评吗?

答:不,我不批评。文学是由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组成的。有些作品会妨碍别人,而有些不妨碍任何人。

问:出版商们应对目前的这种精神状态负责吗?

答:过去,出版商的职业与商业无关。费舍尔,多家德国资深出版社的前身,曾这样阐述自己的宗旨:“出版公众不想要的书。”热罗姆·兰东也是这样。而今天,损失金钱是愚蠢的行为。在那个时代,以此挣钱才是可耻的。

问:文学创作因此而受影响了吗?

答:我不喜欢批评。我的意思是:我们所害怕的只是年轻的作家们抑制他们的才能。但他们真的想妨碍别人吗?也许我们应该谴责的是这个时代。

问:您的作品被广泛地翻译。为什么您在国外的名声反而超过在国内的?

答:外国人对我的作品感兴趣如同他们对一些法国特色产品感兴趣一样,如波尔多葡萄酒、浓烈的奶酪,香水等等。他们觉得自己能够比我们更好的制造畅销书。这就是我在活着的法国作家中作品被译成中文最多的原因。

问:您的电影对您的书的传播还是大有帮助的吧?

答:电影面对的是另一个群体。它让你成为明星;它吸引那些爱看热闹的人。我的电影通常被普通观众认为是无法理解的,但他们还会来看:我的电影里性的吸引力比小说中的强烈多了。例如《穿越欧洲的快车》中,特兰蒂尼昂扮演的男人曾多次强暴玛丽·法朗士·皮西埃演的那个女人。这两个演员都很美,于票房有益。虽然这么说,后来,这

些电影使我失去了诺贝尔奖。1985年我被提名,很有希望获奖,而当年瑞典电影协会组织的回顾展激起了当地媒体对法国式海淫的愤怒。最终是克洛德·西蒙得到了诺贝尔奖;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选择,我极为赞同。

问:您如何看杜拉斯晚年的巨大成功?

答:我非常喜欢《情人》,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尽管它的成功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我在美国曾开课论述它的奇特结构。很久以来,杜拉斯和我关系密切;最初她是一个年轻、滑稽、活泼而且热情的妇人。但后来,她变成了众人口中那个骄傲的大人物。每个正常的作家都会坚信自己是最伟大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只是她无法想象别的作家同样伟大……我记得有一次,审查她的电影《卡车》的样片之后,她对我说:“片子如此美,我竟然流泪了。再没有谁能像我一样拍电影。”如同福楼拜和马拉美,她总在幻想着最后一本书,无法超越、毁灭性的作品,并以此来结束她的写作生涯。

问:您是怎么反应的?

答:我笑……这对她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她只允许绝对的赞赏。多米尼克·诺盖兹提到她时曾说:“杜拉斯在传言包围之中一直前进。”然而成名并无损于她的文学天才,而只是让她出了点毛病。如此而已。她不再正常了,戒酒毁了她的身体。但是,杜拉斯已经习惯于神化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仍然依稀听到她在我耳边说:“我酗酒。你可轮不到这事!”

问:是啊。那您呢?大家都想了解您在忙些什么……

答:我手头上有一本书和一部电影,但我不想说。我还不知道我的工作会有怎样的结果。

问:就像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您是怎么判定此处用电影语言,而彼处用文学语言呢?

答:如果我的想象是语言的,我知道将是一部小说;如果是画面和声音的,那就将是一

部电影。

问:有没有一些导演曾经请您写电影?

答:当然有!我和阿兰·勒内合作了《去年在玛丽昂巴德》。但别的导演都不愿意让我直接写分镜头的剧本。与安东尼奥尼在一起时,我刚开口说:“起初,我们看到……”他立刻制止我:“不,你只要给我讲述故事。”我回答他:“不行;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我想到的是我们从屏幕上看到什么。”很无奈……

问:这让您对电影失望了吗?

答:没有没有!为什么要失望?我已经完全自主地制作了十来部长片。那些大的电影节不喜欢我的片子,却喜欢找我做评委,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长,又找我做评委会的主席了。整个的电影界为文学所倾倒。看看特吕弗和罗梅尔:他们都是失败的作家。而制片人都喜欢改编小说——作家们在此享有盛誉。尤其是当他自己也拍电影时……太完美了。

问:您怎么看自己的电影在电视上播放的?

答:但电视台并不喜欢我的电影!

问:为什么呢?

答:由于他们的剧本。电视台更倾向于勒内,因为他的电影迎合大众口味——这是他的悲剧。雷内希望得到观众的承认,他也不会如戈达尔一样制作低成本影片,而戈达尔是不需要我的……

问:我们再谈谈法国文学吧。您如何看当今的法国文坛?

答: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年代。没有杜拉斯,也没有克洛德·西蒙。让·艾什诺兹,让-菲利普·图森,雷诺·加缪,他们都是好作家,但他们都热衷于卖书。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即使是对于晚年热爱金钱的杜拉斯而言。

问:作家的媒体化往往会改变一切。您是不是躲避媒体,就像于连·格拉克一样?

答:不,我不干于连·格拉克那一套。时不时地我会出现在电视上。我不是个孤僻的人。我对画家、电影工作者、作家们的圈子抱有很大的好感。我喜欢写作的人们之间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也喜欢参加一些聚会,在索穆尔的日子里,我们共享“书籍与葡萄酒之日”。我非常拥护“全世界作家们,联合起来”。另外,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多种文学,而不是只有一种惟一、好的文学。而且,可庆幸的是,在这个圈子里,我们总会碰见一些不可能的人……因此,在文学的圈子里,我有一些朋友——有些简直出乎意料,如罗伯特·萨巴蒂耶和弗朗索瓦·努里西埃。而且即使我不喜欢我的话被记在纸上,我还是经常心甘情愿地发言:这次就是证明!

[译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刘 阳)